

唐初《礼记》地位的提升 与北朝礼学传统[※]

潘忠伟

【摘要】从全部的中国礼学史着眼，隋唐礼学正处于对两汉、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礼学进行整合的重要时期，《礼记正义》正是其时礼学风貌的代表作。孔颖达等人选取《礼记》及郑玄注为权威经注本，并为之撰作《正义》。在这当中，以孔颖达为典型的唐初官方学者，颇为重视北方礼学传统，强调《礼记》为三《礼》学的重心所在，并在这一基础上整合南北礼学。而融合的结果，是使得郑玄礼学体系更具义理色彩。这对唐、宋以来的官方礼学具有深刻的影响，也改变了中古礼学的面貌。

【关键词】郑玄；《礼记》；北朝；孔颖达

【中图分类号】B241 【文献标识码】A 【文章编号】1008-0139(2011)03-0112-5

三《礼》是指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和《礼记》，在郑玄注三《礼》之前，并无三《礼》之学⁽¹⁾。郑玄的三《礼》学大致上以宗主《周礼》为主，其注释《仪礼》和《礼记》，多援引《周礼》裁定分歧、整齐礼制。清代学者皮锡瑞即明确指出郑玄礼学“以《周礼》为经，《礼记》为记，其别异处皆以《周礼》为正”⁽²⁾。而令今人感到困惑的是，唐初官方学者在宗主郑玄礼学的前提下，却认为郑玄《礼记注》为郑玄礼学的重心所在，并为之撰著《礼记正义》。这一看法为后代所沿袭，并形成了以《礼记》为首的三《礼》之学的基本格局。通过考察，不难发现唐初官方学者的这一举措，有其特定的礼制改革之背景和地域学术之立场。

一、礼制改革背景下的唐初官方礼学立场

唐初武德年间的礼制，以因袭隋代旧制为主。我们知道，隋代礼制已初步综结了南北礼学，而尤为重视南朝礼学。这一礼制对于代隋而兴的唐代官方学者而言，当有改造之必要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以颜师古、孔颖达、贾公彦为代表的礼学家，与隋代大业时期的礼学倾向不同，他们持有强烈的北学立场，并以跨越陈、隋旧学为旨归，从而形成了北学色彩极为浓厚的新的唐初礼学系统。

唐开国之初，其官制、重要朝典及祭祀礼仪，以因袭隋代为主。隋代礼制，已有综结南北礼学的趋向。大致上说，在开皇时期，以北周礼学为主，融

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北朝经学史”（编号：10CZX022）的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〔作者简介〕潘忠伟，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讲师，哲学博士，四川 成都 610068。

合北齐及南朝礼学为辅。在大业时期,则进一步采纳南朝礼学,形成了南学为主的礼制体系。《旧唐书·礼仪志》称:“隋氏平陈,寰区一统,文帝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,定《五礼》一百三十篇。炀帝在广陵,亦聚学徒,修《江都集礼》。由是周、汉之制,仅有遗风。”⁽³⁾这段记载对于隋代的官方礼制,持批评的态度,认为隋代礼制之改革,其最终结果,是造成了“周、汉之制,仅有遗风”的局面。在这当中,所谓“周、汉之制”,当指以北周为典型的北朝所推崇的《周礼》及两汉制度。此种关于隋代礼制变革的评价,一方面暗示了隋文帝时期牛弘所撰的《五礼》,其学术立场已趋向于南北兼采,而另一方面也明示隋炀帝时期的官方礼制,已主要遵从南朝礼学而使北朝礼学“仅有遗风”了。

隋代前期,牛弘撰定《五礼》,还保有北朝“周、汉之制”。或者说,牛弘所撰的《五礼》,当保持了北朝礼学的本位立场,融合南北礼学而成。

《隋书·礼仪志》称:“高祖命牛弘、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《仪注》,以为《五礼》云。”⁽⁴⁾考虑到牛弘、辛彦之均出仕于北周,为北周、隋初权威的官方学者,故《隋志》未言其礼学渊源,而直接说明二人对南北礼学均有所整合。值得一提的是,牛弘之撰作《五礼》,是在其时南北礼学整体面貌逐渐趋于一致的前提下实现的。《新唐书·礼仪志》记载:“自梁以来,始以其当时所行传于《周官》五礼之名,各立一家之学。”⁽⁵⁾南朝梁陈以来,官方采取以五礼为纲,各自分立学官的礼学系统。故牛弘修撰《五礼》,极易采掇南朝礼学。

大业之后,官方即逐渐摒弃《五礼》不用,转而遵从杨广在担任扬州总管、镇守江都时期所修撰的《江都集礼》。这一《集礼》,当大量吸取了南朝礼学,故《旧唐志》发出“周汉之制,仅有遗风”的感慨。根据这一点,我们可推断唐代开国之初所遵从的礼仪系统,是以《江都集礼》为主。或者说,唐代武德年间的官方礼学,基本上沿袭了隋炀帝所整合的南北朝礼仪体系。从政治上看,这对于代隋而兴的唐代官方而言,当有重新制定新礼之必要。

事实上,当唐朝政局基本稳定,渐兴文教之

后,就开始注意到礼制之改革。贞观初年,即对礼制进行了第一次改定。《新唐书·礼仪志》记载:

唐初,即用隋礼,至太宗时,中书令房玄龄、秘书监魏征,与礼官、学士等因隋之礼,增以天子上陵、朝庙、养老、大射、讲武、读时令、纳皇后、皇太子入学、太常行陵、合朔、陈兵太社等,为《吉礼》六十一篇,《宾礼》四篇,《军礼》二十篇,《嘉礼》四十二篇,《凶礼》十一篇,是为《贞观礼》。⁽⁶⁾

房玄龄等修撰而成的新礼,史称“《贞观礼》”,又称“《五礼》”。《旧唐书·太宗本纪》记载“甲寅,房玄龄等进所修《五礼》”;作为北朝学者代表人物的颜师古,《新唐书》本传称其曾“与撰《五礼》”⁽⁷⁾。这些都说明《贞观礼》又称《五礼》。《五礼》之称,极可留意。牛弘等人所撰的隋代开皇礼制,亦称《五礼》。这一通称可从侧面反映了唐初定立《贞观礼》,似有跨越隋炀、遥承北周礼学传统的意味。

与官方礼制改革取向基本一致的是,唐初官方学者亦持明确的北学立场,而尤以超越南朝礼学为主要标识。在这些礼官学士当中,活跃于贞观初期的颜师古,在贞观年间已是权威学者的孔颖达以及在贞观后期、高宗时期的著名礼学家贾公彦等三人,堪称是唐高祖、唐太宗以及唐高宗三个不同时期的官方礼学的典型代表。此三人对唐初礼制改革之方向,具有重要的影响力;其学术倾向,亦可代表唐初礼学的基本立场。

关于颜师古,据《新唐书·颜师古传》记载,颜氏其祖由高齐入周,世居关中京兆万年。颜师古早年曾在长安“教授”,唐初历任朝散大夫、中书舍人及中书侍郎等职。在贞观时期,曾“考定秘书”,为秘书少监,后为弘文馆学士,是典型的北方学者。⁽⁸⁾颜师古是唐初礼制改革中强调北学化倾向的重要代表人物。《旧唐书》本传记载:

十五年,……将有事于泰山,……时论者竞起异端。师古奏:“臣撰定《封禅仪注书》,在十一年春,于时诸儒参详,以为适中。”于是诏公卿定其可否,多从师古之说,然而事竟不行。⁽⁹⁾

按，封禅是官方祭祀系统中至为重要的祭典。唐初议定的封禅礼“多从”颜师古之说的的事实，从侧面说明北方学者在官方礼学中的重要地位及影响。

孔颖达也是唐初著名的礼学家，其礼学渊源，亦在北朝。《新唐书》孔颖达本传载其少时“闇记《三礼义宗》”，明郑氏《礼记》⁽¹⁰⁾。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《三礼义宗》为南北朝著名学者崔灵恩所撰⁽¹¹⁾，《梁书·崔灵恩传》称崔氏为清河东武城人，精通三《礼》，先在北魏出仕，后下归南朝，是在南朝梁陈具有较大影响的北方学者⁽¹²⁾。孔颖达之精通崔氏礼学，即为孔颖达承袭北朝礼学的具体表现。贞观年间，孔颖达主持撰定科举考试的权威疏解本《五经正义》，这充分说明孔颖达在唐初官方学术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稍后于孔颖达的著名礼学家贾公彦，其礼学师承与学派倾向，亦可代表贞观后期至高宗时期官方礼学的北学化倾向。关于贾公彦的礼学渊源，据《旧唐书·张士衡传》记载，“士衡既礼学为优，当时受其业擅名于时者，唯贾公彦为最焉”，而张士衡曾“从熊安生及刘焯受《礼记》”⁽¹³⁾，可见贾公彦的礼学思想主要源于北朝学者熊安生、刘焯，为典型的北学系统。在高宗时期，贾公彦“奉敕”撰定《周礼》及郑玄注疏解本，也可说明贾氏是当时公认的礼学大家。

以颜师古、孔颖达及贾公彦等人为代表的唐初学者，以北学为其本位立场，综结南北礼学，而非简单地因袭南朝礼学。在这一前提下，唐初礼学的面貌，便与南朝礼学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别，其具体表现，即在于《礼记》地位得到了提升。

二、北学传统与唐初《礼记》地位的提升

以孔颖达、贾公彦为代表的官方学者，普遍推崇郑玄《礼》学，而尤以推崇郑玄《礼记》之学为突出特点。孔颖达等北方学者重视《礼记》的倾向，与以陆德明为典型的南朝学者不同，是唐初礼学的典型趋向。或者说，孔颖达等人选取《礼记》及郑玄注，并为之《正义》，是以北学为本位，整合南北礼学的结果。

隋唐之际，郑玄三《礼》注堪称是三《礼》盛行的权威注本，在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称：“今《周官》六篇、古经十七篇、《小戴记》十九篇，凡三种。唯郑注立于国学，其余并多散亡，又无师说。”⁽¹⁴⁾文中的“《周官》”、“古经十七篇”、“《小戴记》”，分别指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和《礼记》；文中的“唯郑注立于国学”，是说只有郑玄《周礼》注、《仪礼》注、《礼记》注立于学官。其余三《礼》注本，或“散亡”、或“无师说”，总之，都不能与郑玄礼学相抗衡。

在这一背景下，郑玄礼学继续受到官方重视，也就理所当然。贞观年间，孔颖达等人“奉敕”修撰的《五经正义》，其中礼经类即选取《礼记》及郑玄注为权威经注本。这一择取，既符合南北礼学同尊郑玄的情形，又延续了北方礼学重视《礼记》的传统。《北齐书·儒林传序》称：“三《礼》并出遵明之门。……其后能通《礼经》者多是安生门人。诸生尽通《小戴礼》，于《周》、《仪礼》兼通者十二三焉。”⁽¹⁵⁾北齐以来，北方学者重视《小戴礼》超过《周礼》和《仪礼》。可见孔颖达之选取《礼记》及郑玄注，正体现了北朝礼学的典型风貌。

在此基础上，孔颖达等人又对南北礼学加以整合，可谓是北学融合南学的结果。在《礼记正义序》中，孔颖达强调：

爰从晋、宋，逮于周、隋，其传《礼》业者，江左尤盛。其为义疏者，南人有贺循、贺瑒、庾蔚之、崔灵恩、沈重、范宣、皇甫侃等；北人有徐遵明、李业兴、李宝鼎、侯聪、熊安生等。其见于世者，唯皇、熊二家而已。……虽体例既别，不可因循，今奉敕删理，仍据皇氏以为本，其有不备，以熊氏补焉。⁽¹⁶⁾

考虑到其时礼学“江左尤胜”这一状况，孔颖达等人之整合南北礼学，便以参考南朝皇侃义疏为主，以采纳北朝熊安生义疏为辅。

在这里，需要略作说明的是。孔颖达《序》的这一取舍，给人造成一种印象，以为唐初官方礼学实为尊崇南学而非北学。这一看法不仅忽略了北朝礼学“尽通”《礼记》、粗通《仪礼》、《周

礼》这一状况,而且与南朝礼学的实际面貌颇有出入。隋唐之际的南方大学者陆德明,在南朝陈末撰成的《经典释文》,其《序》可谓代表了南朝经学的权威观点。在《经典释文序》中,陆德明认为《礼记》只是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的补充性著作,《礼记》的重要性不能与《周礼》、《礼仪》相抗衡。《经典释文序录》称:

《周》、《仪》二礼,并《周公》所制,宜次文王。《礼记》虽有戴胜所录,然忘名已久,又记二《礼》阙遗,依类相从于《诗》下,三礼次第,《周》为本,《仪》为末,先后可见。⁽¹⁷⁾

陆德明将《礼记》定位于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“阙遗”的补充性著作。相较而言,孔颖达等人更为重视《礼记》。孔颖达《礼记正义篇首》称:“至孔子没后,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闻,以为此《记》。或录旧礼之义,或录变礼所由,或兼记体履,或杂序得失,故编而录之,以为《记》也。”⁽¹⁸⁾孔颖达认为《礼记》虽然驳杂,但《礼记》包含了礼的内涵、渊源以及得失,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。或者说,孔颖达之重视《礼记》及其依据,与以陆德明为代表的南学系统相异,是颇为明显的事实。

与孔颖达共同撰作《礼记正义》的贾公彦,则体现出对南朝礼学的轻视态度。贾公彦《仪礼疏序》提到:“《丧服》一篇,凶礼之要,是以南北二家,章疏甚多,时之所以,皆资黄氏。”⁽¹⁹⁾文中所说的“黄氏”,为北齐礼学家黄庆。南朝《礼》学当中的极盛之学,当属以疏解《丧服》为标识的丧礼之学,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的南朝学者关于丧礼的解释性著作,不下四十余种⁽²⁰⁾。贾公彦在关于《丧服》的疏解参考著作中,竟对南朝学者一无所取,而完全参考北齐黄庆之学。其“时之所以”的解释,又充分说明唐初施行的丧服制度,主要承袭了北学传统。在南北礼学渐趋融合的背景下,唐初学者之重视《礼记》,可说是北朝礼学传统与社会礼俗风貌共同影响下的结果。

总而言之,孔颖达等人提升了《礼记》在三《礼》当中的地位,可说是遵从北方礼学传统的典型表现。而其撰作的《礼记正义》,又注意吸取南朝礼学的成果并加以折衷,又是对郑玄礼学的

深入发展。

三、唐初学者对郑玄礼学体系的义理化

孔颖达等北方学者之重视《礼记》,是在沿袭北学和郑玄礼学基础上的结果。而孔颖达等人之发挥《礼记》学说,又与郑玄礼学和北朝礼学有所区别。或者说,孔颖达对原有的南北朝郑玄礼学,既有继承,也有发挥。其中的继承,是沿袭了郑玄《周礼》为体、《仪礼》为履这一说法;其中的发挥,是孔颖达在融合南学的基础上,形成了以《礼记》及郑注为依托的礼学义理体系。在这当中,尤为突出的是孔颖达对礼源于“太一”的诠释。

以孔颖达、贾公彦为代表的官方学者,对于郑玄礼学体系中《周礼》与《仪礼》的关系,持《周礼》为体、《仪礼》为履的看法,这与南朝礼学家的看法是一致的。孔颖达《礼记正义篇首》称:

郑作《序》云:“礼者,体也,履也。统之于心曰体,践而行之曰履。”……礼虽合训体、履,则《周官》为体,《礼仪》为履,故郑序又云:……是《周礼》、《礼仪》有体、履之别也。所以《周礼》为体者,《周礼》是立治之本,统之心体,以齐正于物,故为体。贺瑒云:“其体有二:一是物体,言万物贵贱高下小大文质各有其体;二曰礼体,言圣人制法,体此万物,使高下贵贱各得其宜也。”其《仪礼》但明体之所行践履之事,物虽万体,皆同一履,履无两义也。⁽²¹⁾

孔颖达之《周礼》为体、《仪礼》为履的看法,与陆德明之《周礼》为本、《仪礼》为末的见解相类似,均为阐发郑玄的提法。而关于“体”的解释,孔颖达引用南朝礼学家贺瑒的说法,是其综结南北礼学的具体表现。

在这一问题上,贾公彦亦持类似看法。《周礼·春官宗伯第三》提到:“乃立春官宗伯,使帅其属掌邦礼,以佐王和邦国。”郑玄注:“礼谓曲礼五,吉、凶、宾、军、嘉,其别三十有六。”贾公彦疏:

云“礼谓曲礼五”者,案《礼序》云:“礼者,体也,履也。”一字两训,盖有以也。统之于心名为体,《周礼》是也。践而行之名曰履,《仪礼》是也。⁽²²⁾

又，贾公彦解释“仪礼”之名的含义时，再次强调这一看法。在《仪礼注疏》“仪礼”题下的贾疏中，提到：“又《周礼》是统心，《仪礼》是履践，外内相因，首尾是一。”⁽²³⁾

或者说，孔颖达、贾公彦等人与南朝礼学家一致，均接受了郑玄“礼兼体、履”的说法，亦即遵从了郑玄的整个礼学体系架构。

孔颖达等人之发挥郑玄礼学，在于孔颖达等人着意提高《礼记》的地位，并以《礼记》及郑玄注为依托，形成了一个以《礼记》为依托的义理化的礼学体系。《礼记正义篇首》称：

郑作《序》云：“礼者，体也，履也。统之于心曰体，践而行之曰履。”郑知然者，《礼器》云：“礼者，体也。”《祭义》云：“礼者，履此者也。”《礼记》既有此释，故郑依而用之。⁽²⁴⁾

意思是说，“礼兼体履”的依据，是《礼记》中《礼器》和《祭义》两篇当中有类似的提法。郑玄就是依据《礼记》的这些说法而形成这一简介的。

进一步言，在孔颖达等人看来，《礼记》的重要意义，在于它是理解《周礼》和《仪礼》中关于礼之理或者说礼之义的重要著作。正如《礼记正义》篇首提到：“或录旧礼之义，或录变礼所由，或兼记体履，或杂序得失，故编而录之，以为

《记》也。”⁽²⁵⁾所谓“旧礼之义”，正是礼的根本意蕴；所谓“变礼所由”，是指礼之所以然；所谓“体履”，乃指礼之体用。《礼记》记载的主要内容，不外乎此，而《礼记》的重要性，也即在于此。故孔颖达在《礼记正义》篇首中，又提到：“夫礼者，经天地，理人伦，本其所起，在天地未分之前。故《礼运》云：‘夫礼必本于大一。’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礼也。”⁽²⁶⁾文中提到“天地未分之前”，略有形上之意味。孔颖达等人在《礼运》篇“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”句下，疏：

“必本于大一”者，谓天地未分，混沌之元气也。极大曰天，未分曰一，其气既极大而未分，故曰大一也。礼理既与大一而齐，故制礼者用至善之大理以为教本，是本于大一也。⁽²⁷⁾

文中将“大一”解释为“混沌之元气”，而“礼理”即含于“元气”，正是孔颖达等人将郑玄礼学义理化的突出例证。

此种从义理的维度诠释郑玄礼学体系，是唐初学者对郑学进行的新的阐释。此种新解，无疑也影响了郑玄礼学的整体面貌。或者说，自唐以来，随着《礼记》在三《礼》之学中地位的提升，孔颖达等人将礼学义理化的倾向也逐渐被后人所重视与发挥。

【参考文献】

- (1) 杨天宇. 郑玄三礼注研究 [M].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07. 57.
- (2) 皮锡瑞. 经学通论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54. 55.
- (3) (9) (13) 刘昫. 旧唐书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5. 816, 2595, 4949.
- (4) (11) (15) (20) 魏征. 隋书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3. 107, 924, 926, 919-921.
- (5) (6) (7) (8) (10) 欧阳修、宋祁. 新唐书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5. 305, 308, 5642, 5642, 5643.
- (12) 姚思廉. 梁书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3. 676-677.
- (15) 李百药. 北齐书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2. 583.
- (16) 孔颖达. 礼记正义序: 十三经注疏 [M]. 阮元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0. 1222-1223.
- (17) 陆德明. 经典释文序录: 经典释文汇校 [M]. 黄焯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6. 5.
- (18) (21) (25) (25) (26) 孔颖达. 礼记正义: 十三经注疏 [M]. 阮元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0. 1226, 1229, 1229, 1226, 1229.
- (19) (23) 贾公彦. 仪礼疏: 十三经注疏 [M]. 阮元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0. 945, 945.
- (22) 贾公彦. 周礼注疏: 十三经注疏 [M]. 阮元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0. 752.
- (27) 孔颖达. 礼记正义: 十三经注疏 [M]. 阮元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0. 1426

(责任编辑 李远国)